

士之能者：

刘敦桢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现代起步（上）

LIU Dunzhen and the Modern Start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Study (Part I)

赖德霖 | LAI Delin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 (2022) 05-0004-15

DOI: 10.12285/jzs.20221020001

摘要：与梁思成一样，刘敦桢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但相比于梁思成，目前有关他的研究远欠深入。这不仅导致他工作的意义被低估，也使得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理路难以得到全面认识。本文试回答四个问题：刘敦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步于何时？他如何与营造学社结缘？他的研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范式的形成，乃至对中国建筑研究发展的特殊贡献究竟何在？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证，刘敦桢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方法自觉且见地精深的学者。他与梁思成有着相似的学术关怀，分享着若干一致的治学理路，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他与梁思成在营造学社创始者们的基础上将中学、西学和东洋学相结合，共同开辟了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之路。

关键词：刘敦桢，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梁思成，伊东忠太，关野贞，滨田耕作，田边泰

Abstract: Like LIANG Ssu-ch'eng, LIU Dunzhen was a key founder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But compared to LIANG, current studies on LIU have underestimated LIU's contributions. As a result,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cholarship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SRCA), in which LIU was a core member, remains incomplete. This paper answers four questions: When did LIU start his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How did he come across with the SRCA? How was his work influenced by his time? And most important, what was the uniqueness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IU had already been a knowledgeable, insightful, methodologically mature scholar before he joined the SRCA. Although LIU and LIANG shared similar concerns in research and took similar approaches in their work, he contributed to the SRCA with his special perspective. He and LIANG worked together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SRCA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udy by combining methodologies of Western sinology and Japanese *Toyogaku* with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s.

Keywords: LIU Dunzhen,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SRCA), ZHU Qiqian, LIANG Ssu-ch'eng, ITO Chuta, SEKINO Tadashi, HAMADA Kousaku, TANABE Yasushi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梁惠王》

柏长寿，谆谆不倦，教我后学。弟子梁思成敬祝。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①

身在南京的刘敦桢也偕妻子写道：“桂师尊鉴：

旬前奉上寸柬计达座右。回忆民国初季先生发现营造法式抄本，究心宋法式与清做法，进而组织营造学社，以完成中国建筑史，勉励后进，培养人材。今日建筑学术界在党领导下蓬蓬勃勃，一日千里。然当年先生筚路蓝缕之功，固亦垂诸不

1961年朱启钤90华诞，梁思成和刘敦桢都发来了贺信。梁在信中说：“桂师治我国古代营造之学，倏忽卅载，解放以来，百废俱兴，建筑事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卓有成绩。辛丑初冬，欣逢师九秩大庆，谨奉此册，祝杖履康健，松

作者：
赖德霖，（美）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
摩根讲席教授。

朽。敦桢亲聆教益三十余年，于兹受惠之深，楮墨难罄。际此九秩大庆，理应赴京祝嘏，乃疾病纠缠，不克北上。而朱君鸣泉来信云苏州绣影不能如期付邮，下怀尤为不安。谨此专函，祝寿，兼述歉忱，尚恳海涵于格外。临颖不尽万一，专肃敬叩寿安。门人刘敦桢上 陈敬同叩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②

两位当时中国建筑研究的执牛耳者都对朱启铃执弟子礼，并对他的开创之功和栽培之恩表达了由衷的感念。

今天，学界对梁思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肇始、加入营造学社的起因，以及他和林徽因的中国建筑叙述背后所体现的美学和社会思想已有较为清楚的了解。但相对而言，对于同样是中国建筑史学科重要奠基人的刘敦桢，学界和社会目前的认识尚有欠清晰：他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步于何时？他如何与营造学社结缘？他的研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他对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范式的形成，乃至对中国建筑研究发展的特殊贡献究竟何在？由于这些问题答案不清，不仅刘敦桢工作的意义被低估，有关中国营造学社学术理路的认识有欠全面，而且有关中国建筑史建构过程和这一学科基础格局的理解也存在极大缺失。包括笔者以往研究在内^③，目前学界乃至社会有关中国营造学社的认识多以梁思成为主导，视破解《营造法式》为学社的工作目的，并强调西方学术思想——如风格概念和结构理性主义——在营造学社中国建筑史建构方面的影响，却忽视了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发展初期在方法论及研究视野方面的贡献，也甚少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如经学、史学、营造学——以及日本东洋学建筑研究在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起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本文共分“初涉中建”“崭露头角”“北行考察”“结缘学社”“兼职宁苏”“‘九·一八’后”“入职学社”“研发新刃”8节，试图通过汇集史料，厘清刘敦桢的经历，并深入探讨他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和之初的学术活动与学术见解，在上述四个方面增进学界和社会对于他的理解。笔者将论证，刘敦桢

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方法自觉且见地精深的学者。他与梁思成有着相似的学术关怀，分享着若干一致的治学方法，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他与梁思成在朱启铃等营造学社创始者们打下的基础上将传统中学与近代西学和东洋学相结合，共同开辟了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之路，也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贡献了一个记录着一代学人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忍辱负重、戮力同心、赶超先进、推进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事迹的生动篇章，而且有关中国建筑史建构过程和这一学科基础格局的理解也存在极大缺失。

一、初涉中建

刘敦桢（1897—1968），字士能，祖籍湖南新宁。刘氏为当地望族，曾出有刘坤一、刘长佑两位晚清总督。据《刘敦桢全集（十）》中由刘的哲嗣刘叙杰教授编写的《刘敦桢先生生平纪事年表（1897—1968）》（以下简称《年表》），刘父永涛曾任江苏东台县令。刘从四岁开始接受传统文化启蒙教育。这一背景对于理解他日后的研究所体现的深厚的国学功底极为重要。又据《年表》，刘于1913年以官费录取赴日留学，1921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现东京工业大学）建筑科，与日后多有合作的柳士英和朱士圭为校友。他1922年2月回国到上海工作。同年与柳等共创上海华海建筑师事务所（按：当为华海公司建筑部，见本文注释^④）。又于1923年8月与柳、朱共创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以下简称“苏州工专”）建筑科，复于1925年6月至长沙湖南大学土木系执教，设计了湖南大学“二院”教学楼及城内名胜天心阁，1926年返回苏州工专继续任教。^⑤

据刘叙杰教授所写另一篇介绍，刘敦桢在1921年3月大学毕业后，还曾在老师池田先生所在的建筑事务所实习，9个月后回国。在加入华海之前，他还曾受聘于上海绢丝纺织公司任建筑工程师，承担了该公司所属的若干工业厂房的建筑设计任务。^⑥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刘留学归国后工作并不稳定。有史料表明，从1924

年秋开始，江苏省教育厅积欠省校教师薪水超过半年，曾使“教职员枵腹维持，已达极限”。^⑦时柳士英为苏州工专建筑科主任。^⑧若刘也在创始教师之列，他1925年暂时离苏赴湘或许与当时学校的经济状况不佳有关。

又若刘敦桢设计的长沙天心阁方案为一仿古建筑，则该项目当为他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建筑之始。但遗憾的是，笔者迄今尚未查到有关这一设计的文献和图像史料。^⑨目前他开始研究中国建筑的确切时间只能追溯到1926年他重返杏坛之时。据其自述，1926年秋他在苏州工专任教时结识了“当地木工之领袖”姚承祖。^⑩姚承祖（1866—1938），字汉亭，号补云，出身吴匠世家，曾开办“姚开泰木作”，并任教苏州工专。其承建工程包括灵岩山大殿及怡园藕香榭等。^⑪1931年6月25日吴县营造业同业公会成立，姚当选主席。^⑫刘比姚年轻31岁，但二人“以同气之求”而“过从渐密”，曾于“春秋佳日，相与放怀山水，周访故迹，旁及第宅、园林，析奇辩难，遂成忘年之交”。姚在晚岁“本其祖灿庭先生所著《梓业遗书》，与毕生营造经验，编撰《营造法原》一书，以授工校诸生”。^⑬这番自述表明，刘此时已有志研究传统建筑，并与苏州工专同仁邀请姚到校讲课。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成立的东京帝国大学从1889年至1901年聘请负责皇室工程的宫内省一等匠手、内匠寮技师木子清敬（1844—1907）任教造家学科（建筑科前身）并讲授《日本建筑》，培养出伊东忠太（1867—1954）和关野贞（1868—1935）等日本第一代建筑史家。^⑭柳、刘等曾留学日本，他们极有可能是在借鉴这一做法。

苏州工专建筑科开设有29门课。^⑮据施用披露的该科第二届毕业生李寿年回忆，当时教师共有9名，其中柳士英教授西洋房屋构造学、建筑意匠学和建筑图案，朱士圭教授建筑材料、施工法和工程计算，刘敦桢教授中国建筑史和庭园设计，姚承祖则负责教授中国营造法。^⑯

另有材料表明，在此时期，刘敦桢还极有可能已开始阅读1925年由朱启铃和

陶湘等整理出版的宋《营造法式》新本。如他在1932年发表的《大壮室笔记》中曾就《营造法式》中的“櫨”这一构造细节说：

“民国丁卯（按：1927年）夏，愚于苏州燕家浜友人柳士英君宅中，见其厅堂结构古陋，柱下之櫨赫然呈于目前，询知宅属华姓，建筑年代不明，嗣周元甫（按：苏州市政筹备处工务科科长）君以影片见贻（图1），虽其櫨下无础，櫨之形状比例，亦未与《营造法式》吻合，然自绍兴间王唤重刊此书于平江以来，历时约八百载，旧法犹存一二，不失宋式建筑变迁之一参考也。”^⑩

“櫨”是柱和柱础之间的防湿层，目的是防止地面上的积水或潮气沿木纤维上升，腐蚀柱根。《营造法式》卷五有其做法。我们很难想象，如若未曾读过《法式》，刘能够注意并记住朋友所住老宅中这一构造处理，并在若干年后把它与这本古籍中提到的一个细部做法相联系。

不过1927年夏刘敦桢已不在苏州工专任教。该年3月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6

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将原国立东南大学和省立苏州工专等江苏境内专科以上9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刘、柳等苏州工专教师并未如《年表》所言与建筑科学生同时赴宁，而是改到当年6月成立的苏州市政筹备处（以下简称“市政处”）就职。^⑪1928年2月16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决议改名为江苏大学，4月24日又议决改名为中央大学。刘在第四中大改名之前获聘，并在同年2月底离苏赴宁。该月24日的《苏州明报》曾披露这一消息（图2）。记者说：

“市政筹备处工务科技正刘士能君，专精建筑工程，学识经验，均极宏富，品格尤为纯洁，在处服务八月，于设计实施，各项工作，均极努力进行。该处主任，工程师裴科长（按：当为工务科长裴冠西）等，咸资臂助。现闻第四中大工学院，敦聘为建筑科专任教授。刘君任职以来，对于都市设计，颇饶兴趣，深愿继续规划，以臻完美。兹因限于生活，及处中经费竭蹶，待遇未能适当，以致挽留无术。此后该处进行事宜不无影响。深为吾苏市政前途惜也。”^⑫

第二天，该报又报道了市政处同仁和县市官员为刘敦桢饯行的消息，全文如下：

“市政筹备处工务科技正刘士能君，就第四中大工学院聘，业志昨报，兹悉该处同人，以刘君对于职务，非常努力，临别不胜依恋，故昨午由范养吾（按：市政筹备处总务科科长）、汪蔚青（按：职务不详）、章君畴（按：1927年任苏州公安局局长）三科长饯之于乐意公司，晚间王县长（按：当为县长王纳善）、柳工程师（按：当为工务局长柳士英），又饯之于宴月楼，并请各科科长作陪，觥筹交错，至九时始散。闻刘君并愿于苏州市政，随时仍有贡献云。”^⑬

这两篇报道是刘敦桢在苏州市政处任职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成绩，以及与上级和同事良好关系的极佳证明，其中也透露出他当时的工作条件，即在生活待遇上遇到的困难。根据第一篇报道所说的“在处服务八月”，可以推知他在市政处工作的时间为1927年7月至1928年2月。

二、崭露头角

刘敦桢在苏州市政处就已显露的颇为“宏富”的“学识经验”使他很快成为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的一名骨干教师。据刘叙杰教授忆述，他曾教授的课程包括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史、中国营造法、西方建筑史、建筑营造法、阴影透视、建筑测量和钢筋混凝土结构^⑭，涉及建筑学专业教育除材料和设备之外的各主要方面。1933年8月《中国建筑》杂志发表的《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小史》一文说，1927年该系初建时“聘刘福泰、李毅士为专任教授，……一切规模设备，未臻完善，嗣经卢奉璋、刘士能、贝季眉三先生相继来校，主持教务，更添置各种模型，及中外图书，于是逐渐成为国内唯一之建筑工程科。”^⑮由此可见，刘的到任对于促进中大建筑工程系办学体系的建立和成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刘敦桢在中国建筑研究方面的成绩也开始得到学界重视。离开苏州仅



图1：“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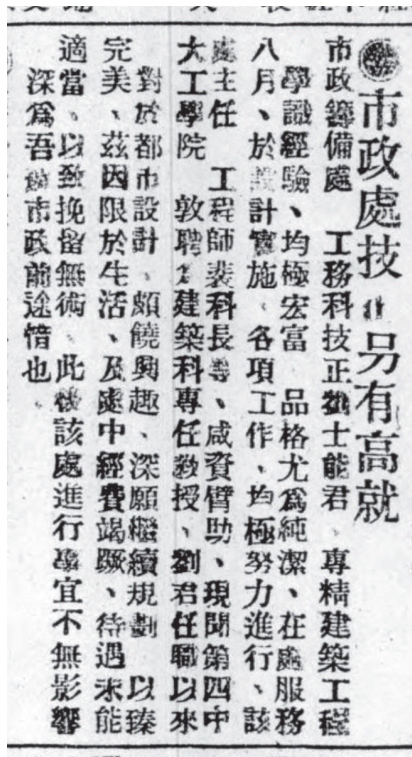


图2：《市政处技正另有高就》

两个月，他就在4月13日于当时还名“江苏大学”的中大梅庵举行的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的第四次常会上做了一场讲演。据记者报道，此次活动到会60余人，由会长蔡元培亲自主持并致开幕词。^②中国科学社由一批中国留学生在1914年3月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宗旨是“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该社1918年迁回中国，设总社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也即日后的江苏大学及中央大学。至1928年该社已有会员700余人^③，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学组织。刘获邀讲演，说明他极有可能也是该社社员。

同据记者报道，刘敦桢的讲演“对于佛教在中国建筑上之关系，讨论透彻”^④。其讲演稿应即一个月后发表于该社社刊《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⑤目前已知刘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22年5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田径、游泳竞技运动法》。^⑥《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则是其第一篇建筑专业学术论文。他在文中首先历数佛教给中国建筑在装饰和雕刻方面带来的种种变化，但之后又重点指出佛教对于中国建筑结构和构造之影响甚微。他又说：“不仅是也，即佛教特有之建筑，如寺、塔、石窟之类，最初模仿印度式样者，不出数百年间，亦浸淫同化于中国建筑之内。”例如，塔之构造“自石造易为砖造，再易为木造，塔之层数，自三层五层，增至十三层或十五层，塔内设佛龕，又置梯级以便登临，其外部更绕以栏廊，覆以重檐，则与我国楼阁建筑同一构造矣”。而寺的配置之法“纯为我国均衡对称之方式，非复印度旧观矣”。石窟寺至隋唐也有同样趋势，因为这时期营造的天龙山石窟“内已无支提塔，且于窟前辟走廊，廊端镌柱、梁、斗拱之属。其上护以短檐，与我国木造建筑物同一形状焉”。简言之，这篇文章是以建筑为例，指出中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同化能力。

1924年，刘敦桢的挚友、时任上海华海公司建筑部建筑师并兼苏州工专建筑

科主任的柳士英曾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建筑，说它“暮气沉沉、一种颓靡不振之精神……道德之卑陋，知识之缺乏，暴露殆尽”^⑦。这种否定中国传统的态度和做法在1910年代中期兴起并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十分常见。很显然，较之柳对中国建筑的负面评价，刘在其第一篇专业学术论文中对于中国建筑所表达的态度颇为积极。探讨这一看法产生的背景或许有助于后人了解他涉足中国建筑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初衷，这就是在承认中国建筑对于外来文化具有包容性的同时，指出它所具有的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动摇了先前中国社会精英以科学为文明标志的信念。^⑧针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甚至因此出现的“全盘西化”的主张，一些中国学者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提出多种主张。他们既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或如杜亚泉，主张用中国固有文明补救现代文明之不足^⑨；或如章士钊，主张“新旧调和”^⑩；或如梁漱溟，通过与其他文化比较，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对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意义。还有学者通过回顾历史，论证它面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⑪例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就曾试图用历史上中国对外来征服者的同化事实激发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信心。陈的名作《元西域人华化考》著于1922—1924年，他说正是“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⑫。他在书中论证，在元代外族统治之时，中国文化依然保持了其优越性，故得以在儒学、佛道、文学、美术、礼俗、女学等多方面同化西域。他总结说：元时西域土族“其旧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⑬。陈所举的证据中甚至包括元代蒙古统治者放弃庐帐而以汉法建造宫阙这一建筑案例。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柳诒徵（1880—1956）是与北京陈垣齐名的南京著名历史学家。他在1919—1921年写作

了《中国文化史》，并在1928年由中央大学出版社排印本。该书旨在“求人类演进之通则”，“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并以文化的各类表现为重点，内容包括物产、衣裳、图画、雕刻、礼俗、乐舞和学术，以及建筑。柳指出虽然中国也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但众多强悍的少数民族最终还是同化于汉族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各族人民之间的沟通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独特之处。^⑭

刘敦桢在自己的论文中指出，面对外来佛教的影响，中国建筑也表现出其包容性。这一点与陈垣在和柳诒徵在其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相似。1945年他在中国建筑师学会年会以《中国之塔》为题的讲演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上述见解，并以此鼓励在座的中国建筑师。尽管他17年前的论文较关注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整体命运，而此时他更关注具体的专业领域的发展。他说：

“六朝唐宋之间，我们的匠师们，一面接受印度佛塔，一面不以模仿而满足。他们将圆形的印度塔，改为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同时创造木塔，和木塔系统的砖石塔，其后又改变墓塔与密檐塔的式样，为我国文化，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杰作。这样精神，值得我们建筑师瞻仰崇敬。现在我们又像汉代接受印度佛塔一样，正在接受欧美的新建筑。当然短期内，不能脱离模仿阶段，自不待言，但不久的将来，定能产生一种适合国情的新的式样，是无可质疑的。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不肯放弃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让前人专美。古人说：鉴古而知今，今天兄弟讲古代的塔，不期而然，联想到我国将来的建筑，对于本会同仁，实是抱有无穷希望。”^⑮

作为一篇讲演稿，《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在发表时没有附参考文献。但究其史料来源不难看出，这篇文章是刘敦桢在研读外国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著作的基础上写成。如文中“我国古代之装饰，……大都取材大自然，如日、月、星、云、山、水、人、物、花、木、虫、鱼、禽、兽之属。此外应用几何图形者，不过雷纹、



图3：“第十六窟入口金刚力士”



图4：1929年夏刘敦桢（左4）率中大建筑系部分教师及高年级学生考察：北上师生与送行人员摄于浦口车站。按：这张照片原注拍摄时间为1930年，现根据报纸报道时间改正为1929年。照片中左3当为卢树森（奉璋），6名系绑腿者当为6名同行学生。他们均在1925年入学苏州工专，1927年随校进入中央大学。

菱纹、斜纹、波纹、连锁等极简单之图案而已”，这句话在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中就有极为类似的表达。^{⑤6}此外，该文中提到的天龙山石窟也值得特别注意。该石窟由关野贞在1918年6月30日最先发现并于1921年发文介绍。^{⑤7}1922年外村太治郎与小野玄妙等人等再赴现场拍照并出版《天龙山石窟》一书（图3）。^{⑤8}刘敦桢知道这一发现，说明他在1928年春，甚至离开苏州之前既已了解到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由于此时他尚无更多机会进行实地考察，他在文章中除引用中国传统文献材料之外，在实物证据方面就不得不广泛参考外国学者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

三、北行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经关于中国的研究“汉学”转型为“东洋学”，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即从中国扩展到其周边各国；第二，研究材料范围的扩大，即从传统的文本史料扩展到考古发现及以往被忽视的边缘史料；第三，研究问题范围的扩大，即从传统史学关注的问题扩展到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等更多学科关注的问题，其中包括艺术史和建筑史。^{⑤9}伊东忠太、关野贞，以及他们

之后的滨田耕作（1881—1938）和田边泰（1899—1982）等学者的工作就是东洋学方法在建筑史研究上的体现。他们在广泛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著。其中包括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以及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1925—1931年）。田边是伊东的学生，而滨田更以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著名。在其《支那建筑史》一书中，伊东特别总结了两种“研究中国建筑之方法”：“一为书籍之研究，一为遗迹之调查”。^{⑥0}因日本与中国文字相同，研究中国之史籍甚易，且日人与华人容貌相同，在中国旅行方便，伊东因此认为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或历史，“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⑥1}

刘敦桢显然在追摹这些日本学者的方法。他第一个努力就是超越书本，尝试对中国建筑进行实地考察。1926年他在苏州曾与姚承祖“周访古迹”。1928年春他刚到中央大学不久，又曾与建筑系同仁查访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毁坏的明代著名建筑报恩寺琉璃塔的故基，并向当地民众了解明琉璃窑故址。^{⑥2}在任教中央大学的第二年，他开始在暑假带领学生进行跨省多地的中国古代建筑参观。据《年表》，刘在1930年“7月率中大建筑系师生赴山东、河北及北平参观宫殿、坛庙、陵墓等古建

筑，是为国人最早进行的古建筑教学团体考察活动”。这一时间或许不确。事实上他带领学生所做考察的时间更早，次数也非一。根据已知文献，刘在1932年秋正式加入营造学社之前，曾在1929年和1931年暑假两次带领中大学生北行调研古建筑。据1929年6月27日《民国日报》：

“中大工学院建筑工程科学学生滕照等六人，行将毕业，特在暑期中组织参观团，拟于今日起，由教授刘士能率领，赴曲阜参观孔林，北至泰安，登泰山考察历代祭天台石碣，约一星期后，可达北平，参观清宫、三海颐和园、天拉【坛】等，再赴居庸关、明十三陵、清东西陵及圆明园故址。至于清代热河行宫、大同云冈石之窟（原文）等，则时间限制，不克前往。闻以上各地共需二月勾留，由平返济后，并将取道青岛，参观德人城市设计，再由海道返沪。倘经济充裕或尚须赴杭参观西湖博览会云。”^{⑥3}

这次师生的参观考察在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史上堪称首次（图4）。刘敦桢负责组织和带队，功不可没。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些考察有助于他超越书本知识，积累对实物的了解，对他本人日后的中国建筑研究具有深刻影响。

1930年6月，刘敦桢在中央大学工

学院主办的《工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在建筑史家生涯之中所写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北平清宫三殿参观记》。^④在文中他首先记述了此次参观考察的时间、参与者和所到省份。他说：“民国十八年暑假率领建筑工程科四年级学生，滕熙、刘宝廉、姚祖范、顾久衍、钱湘寿、杨光照等六人考察山东河北等处古代建筑物，前后历程四十余日。”他继而对紫禁城的布局、形制、沿革，以及外朝三大殿建筑的特点进行了介绍，之后就参观所得，归纳了这些建筑在群体效果、阶台衬托、屋顶形状、色彩关系、屋顶斜度等5个方面的优点，以及在造型关系、结构逻辑、细部比例以及施工质量等14个方面的缺点。徐苏斌曾将刘的见解与伊东忠太在1903年发表的《清国北京紫禁城殿门的建筑》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进行对比，进而认为刘受到了伊东的影响。她还认为刘对中国建筑的批评较之伊东更为细致，这是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思想的影响。^⑤

除此之外，该文另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在介绍皇城的布局时刘敦桢说：“【端门】门东为太庙，西为社稷坛（今改中山公园），盖以周制左庙右社为主臬也。”能注意到皇城“左庙右社”的布局，表明此时刘对《周礼·考工记》一书所描绘的周代王城制度已有了解，这当源于他从小就接受到的儒家经典教育。伊东忠太所著《支那建筑史》亦有可能是他这一认识的一个重要参考，如伊东说：“又云：‘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王宫当中经之大道，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即今日北平城尚存此遗风。”^⑥第二，刘在描述太和殿与保和殿斗拱规格时采用的术语是宋代《营造法式》中的“铺作”而非清代的“踩”，说明此时他尚未研习《工部工程做法》。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即刘对建筑形式的敏感和对结构原理的自觉。他对三大殿总结的5条优点和多达14条的缺点均以这两方面为标准（其中1、2、3、6、7、8、9、10、12条关于形式，4、5、11、13、14条关于结构）。例如他在介绍天安门内外的华表时说：“惟华表之云龙图案，颇呆

板纤弱，不及昌平明十三陵华表之豪放雄伟耳。”他比较了清代重建的太和殿和保和殿与“尚存明代建筑之遗范”的中和殿之后说：“梁两端之腕木（Bracket），……其比例过长，外观甚纤弱，……此虽小节，亦可见明清二代建筑之优劣矣。”刘留学所在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所开课程中有《日本建筑历史》，他对建筑形式的敏感和对于结构原理的自觉当也是日本教育的结果。他在参观记中所用的“腕木”（うでぎ）一词是日本建筑术语，相当于中文的“梁头”，也表明他曾学习过日本建筑。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中曾批评清代建筑“皆蹈袭前代之式样而不能及之”，但他并没有对这一观点做进一步论证。^⑦刘敦桢则是通过视觉效果和结构性能的比较分析，得出了褒明贬清的建筑审美评判。而“豪放雄伟”一词在下文他有关明代建筑的讨论中又被多次使用。

刘敦桢第二次北行考察是在1931年夏。他在1933年6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明长陵》的开篇具体提到此行的时间：“民国辛未（按：1931年）七月余与濮张二君（按：即时任教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的年轻教师濮齐材和当年毕业的张至刚）游明长陵。”^⑧他们此次考察还测绘了北平的智化寺并撰写了调查报告《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下节就将论及该报告。^⑨

并非巧合的是，刘敦桢此次北行考察并为之撰写了调查报告的两个个案均为明代建筑。而上文已经提到，1928年春他到南京后不久曾考察过明代报恩寺琉璃塔遗址，下文还将提到，他在1932年春曾参观明岐阳王墓。与此相反，他在同期所写的文章中对于南京的六朝遗迹却鲜有涉及，对北京诸多著名的清代建筑也着墨不多，虽然他在1929年北行考察之后曾撰写有关紫禁城三大殿的参观记，但他所表达的却是褒明贬清的态度。对照此时梁思成对唐代建筑的关注，刘的这一着眼点就更令研究者深思：他何以对明代建筑特别重视？

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有必要了解作为民国新首都的南京当时正在兴起的建设高潮及其对于建筑风格的探求。刘敦桢到南京

任教之时正值这座城市经历的“黄金十年”这一重要建设时期的开端。1929年夏他第一次北行考察之时中山陵第一期工程刚完工不久，孙中山灵柩下葬的“奉安大典”也刚在该年6月1日举行。从1925年中山陵设计开始，国民党人就对建筑的中国风格表现出明确追求。在南京成为首都之后，这一追求继续延续到铁道部（范文照、赵深设计，1929年9月奠基，1930年5月竣工）、交通部（1928年俄商协隆洋行设计，1930年7月开工，1934年底竣工）、励志社（范文照、赵深设计，1929—1930年兴建）等早期政府建筑的设计之上，并在1929年12月公布的《首都计划》被形诸文字，明确规定：“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

但“中国固有之形式”所指为何？是某个地方的建筑所代表的风格还是某个时期的建筑所有的风格？这个问题在1920年代中国建筑史家们的研究开始之前并无明确答案和共识。对于探索“中国固有式”的建筑师们来说，当时南京地区可供中国风格建筑设计的参考依据大致有三：第一是城市及其周边江南市镇和乡村众多的地方建筑；第二是宋式建筑，它在1919年《营造法式》一书被发现之后开始进入中国建筑话语；第三是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兵燹之后在废墟上因陋就简重建的少数晚清官方建筑，如明孝陵享殿和两江总督衙署。很显然，这三种参考依据或失诸简素，或失诸虚渺，或失诸窳劣，都难以满足社会对于新政权气度及其追求的想象。1919年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 Murphy）在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中采用了接近于北京宫殿或寺庙的清官式风格，无疑为探索中西结合的“适应性”建筑确立了新的范式。从1925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开始，这一范式便被更多中外建筑师模仿。

但是，对于推翻了满清统治的国民党人，以清官式建筑风格为参考设计和建设自己的新首都是否理想？或许由于在1920年代后期中国建筑师尚少，社会对于建筑风格的选择也尚不敏感，故相关讨论

并不见于媒体。不过，在首都南京众多以清官式为参考对象的“固有式”设计之外，的确尚有若干对于中国风格的不同探求或认知。留法建筑师刘敦桢在1929年绘制的一系列政府建筑设计图是第一例。他认为“革命成功以后的建设关系将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焦点，当然是南京。换一句话说，南京建设，便是中国新文化表现之发源点”^⑤，所以他的设计将法国装饰艺术(Art Deco)与中国传统装饰图案结合，造型夸张大胆，与既有“中国固有式”建筑截然不同，而颇具创造性和革命性。^⑥建筑史家梁思成作为顾问建筑师参与设计的南京中央博物院是第二例。1935年梁获邀担任了该建筑设计竞赛的评委，由于不满意首奖作品的清式风格，他在之后参照自己考察和发现的辽宋建筑对该设计进行了修改，以使其更具他向往的“豪劲”特点。^⑦此外，早在1890年英国在华传教士和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又译爱迪京，1823—1905)在其所著《中国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一文中就曾高度赞扬明代建筑。他以十三陵为证据说：“观明陵可以证明中国建筑艺术之进化，已达最高点，且足令人惊叹，其威严尊贵之气象，实为外邦所不及也。”这篇文章经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瞿兑之中译并在1931年重刊^⑧，也当能引发业内人士对于明代建筑的注意。

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位于首都，义不容辞要面对国家建设对于中国风格的需要。针对“中国固有式”的社会期盼，刘敦桢和他的同事或许也在寻找自己的答案。他在《明长陵》一文的“附记”中写道：“本文为二年前中央大学建筑系调查古建筑报告之一，旧稿自九·一八后，迄未杀青。近承中大刘福泰先生同意，节录原文，略事补充，于本刊发表。”^⑨这就说明，1931年夏刘带领濮、张两位年轻教师及部分学生北行考察并非个人行为，而是系里工作安排，甚至是学科发展的需要。

极有可能，超越清式，寻找更具汉民族精神的风格就是刘敦桢此行以两处高级明代建筑实例为重点调查对象所望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明长陵》一文中他

表达了与艾约瑟相似的观点，称赞其石牌坊“巨柱排空，为状殊雄健”(图5)，其“雀替与云墩之浮雕，构图颇精美，无后代粗俗之状，知当时建筑艺术，犹未如清中叶以后堕落之甚也”。^⑩他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则称其“转轮藏与诸装修之雕刻花纹，道劲雄朴，发挥明代特征，与清中叶以后表现者迥异其趣”，其藻井雕刻之比例，“以雄壮道劲见长”。^⑪刘的这些话无疑延续了他在1929年第一次北

行考察时就已经形成的褒明贬清的审美态度。他所说的“清中叶以后所表现者”显然指由1734年(雍正十二年)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所主导的清代官式建筑风格。

1931年6月刘敦桢被委以中山陵园仿古风格“光化亭”的设计。^⑫这座重檐八角石亭或许就是他对何为“中国固有式”这一问题的答卷(图6)。相比于更为常见的同类型清官式八角亭，光化亭出檐内敛，石柱粗壮，构件厚实，所以整体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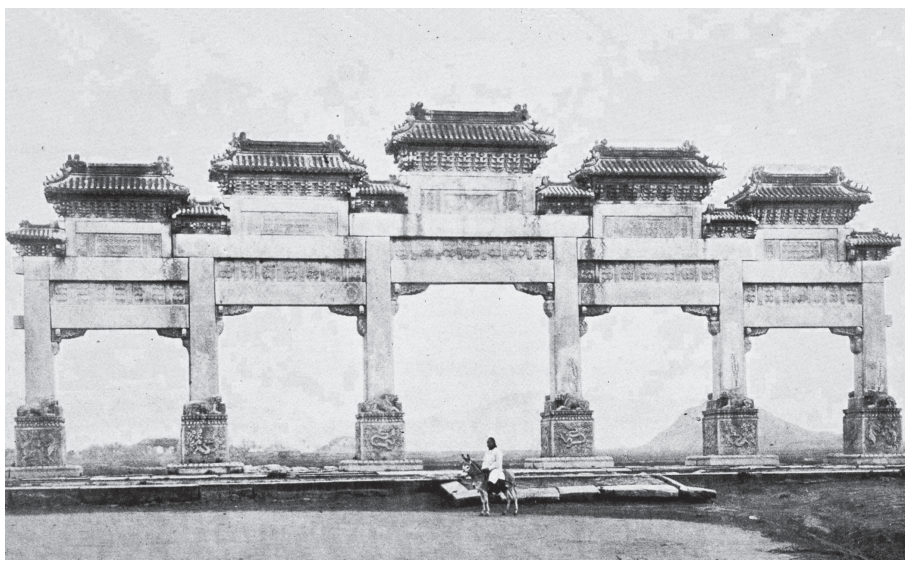


图5：(明长陵)石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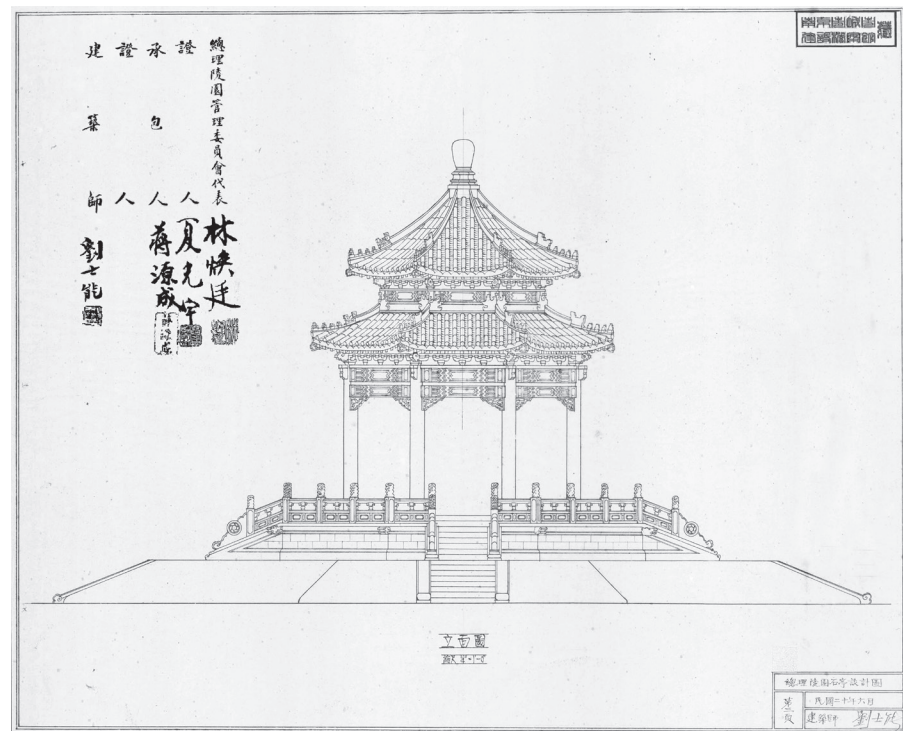


图6a：刘敦桢，光化亭立面图，南京中山陵园，1929年6月(根据蓝图去蓝复制)



图 6b: 刘敦桢, 光化亭, 南京中山陵园,
1929—1932 年

型有欠舒展和秀雅, 不过却因此而显得“雄健”和“道劲”。尽管由于缺少明代八角亭的实例作为比较, 我们很难判断这座石亭是否是正宗的明代官式风格, 但是可以肯定, 它的“雄健”和“道劲”足以使它与遵循《工部工程做法》的“清中叶以后表现者迥异其趣”, 这或许才是刘理想的“中国固有式”。

虽然刘敦桢和梁思成重视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象有所不同, 一是明代建筑, 一是唐辽和宋初建筑, 但从二人分别设计或参与设计的光化亭与中央博物院可以看出, 它们所体现的两位建筑家对于中国建筑古典复兴之路方向的期望并无二致, 这就是雄健与豪劲。

四、结缘学社

刘敦桢两次带中央大学学生北行参观实习也是他与中国营造学社接触并合作的开始, 对他日后的事业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营造学社由曾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督办、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铃 (1871—1964) 创办, 初为私人研究团体。朱从 1914 年开始督办京师市政, 修改前三门城垣, 创建中央公园, 1919 年发现影宋本《营造法式》, 1920 年创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 筑路种树,

1922 年与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著名藏书家陶湘 (1870—1940) 校印《营造法式》, 1925 年又联合同道创立营造学会, 与阚铎、瞿兑之搜辑营造散佚书史, 辑《哲匠录》^⑤, 又“旁求博采, 补所未备, 参互考证”, 刊行了《营造法式》新本。1928 年 3 月在北京宝珠子胡同 7 号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社, 是当时中国国内研究传统建筑的唯一学术团体。1930 年 7 月出版的第 1 卷第 1 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了朱在当年 2 月 16 日举行的学社第一次聚会上的讲演词。他说: “吾中华民族者, 具博大襟怀之民族, 盖自太古以来, 早吸收外来民族之文化结晶, 直至近代而未已也。凡建筑本身, 及其附丽之物, 殆无一处不足见多数殊源之风格, 混融变换以构成之也。”^⑥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刘敦桢在 1929 年第一次北行考察时就与学社有所接触, 也无证据表明他在翌年夏到过北平。不过如果朱启铃读过他在两年前发表的《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或半年前发表的《北平清宫三殿参观记》, 抑或刘看到了《汇刊》中所刊朱对中国文化和建筑的上述见解, 二人必定会心生“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之感。1930 年 12 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本社职员最新题名》中将刘列为学社的“校理”, 这就说明他在此前已与学社有所联系, 此时他的工作也已得社方重视。

1931 年夏, 已经成为学社“校理”的刘敦桢再次带学生北行参观考察。这次他们参观了中国营造学社并与之进行了合作。1932 年 3 月出版的第 3 卷第 1 期《汇刊》在《本社纪事》中对此曾有记录: “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 率领本系学生于暑期来平参观本社工作, 并拟合组旅行团, 赴大同、太原、蓟州、正定等处实地调查。乃以时局中变, 铁路阻兵, 未获出发。只能于近地着手。由本社派出技师, 导引实测智化寺, 为搜集明清建筑上之细部各种实例。并委托代制模型四种; 彩画图案一百余幅, 于十二月竣工, 寄供该校参考。”^⑦此处“十二月”当指 1931 年底, 如此, 则文中提到的时间“暑期”就是该年夏。

就在刘敦桢抵平之前一个月, 关野贞在赴清东陵考察的途中发现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6 月初, 他在北平将这一发现及自己判断它们为辽代建筑的依据告诉了朱启铃。^⑧必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独乐寺, 中国营造学社将蓟州列入与来访的刘敦桢团队合作调查的目的地之一。^⑨当年 12 月, 刘在为自己翻译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一文所写的补注中提到“最近关野氏发现辽初建造之蓟州独乐寺中门”, 表明了他当时对这座辽代建筑已有知悉。^⑩但十分遗憾, 1931 年险恶的政局严重阻碍了中国学者的工作, 也迫使营造学社将对独乐寺的考察推迟到第二年春。《汇刊》文中所说的“时局中变”当指 1931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内部石友三部与张学良部在华北的厮杀争斗。秋初发生的“九·一八事变”, 以及日本随后为掩护溥仪赴东北在天津制造的“便衣队”暴乱——史称“天津事变”。1932 年 3 月出版的《汇刊》在《本社纪事》中还说: “……去年 (1931 年) 秋, 法式组本有平东旅行计划, 借以搜求并研究辽代木建筑遗物数事。于预定出发前二日, 天津便衣队暴动 (按: 发生于 1931 年 11 月 10 日), 北平谣言甚盛, 故未果行。俟时局稍定, 而天已严寒, 不便工作。平东之行遂亦中止。现春又归来, 法式组拟于下月再求计划之实现, 甚望不致再因时局而中止也。”^⑪此时刘敦桢尚在南京, 所以承担这项工作的是 1931 年 7 月入社的梁思成。

未获山西及河北之行的刘敦桢和中央大学师生只能“于近地着手”, 考察北平古代建筑。他们与中国营造学社的第一个合作调查项目是北平的智化寺。刘敦桢在 1932 年 9 月发表的《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中更多地记录了此次与学社合作调查该寺的过程。他说: “愚于旧夏啣中大建筑系之命, 来平调查古物, 闻社友南策 (按: 即刘南策)、心如 (按: 即陶洙) 诸先生言, 城东有智化寺创于明正统间, 虽墙垣倾圯, 檐牙落地, 而规范犹间有存者。就中万佛阁之藻井, 云龙蟠绕, 结构恢奇, 颇类大内規制, 非梵刹

所应有，因约往观。诂至该寺而藻井已亡……因测绘其大概而归。归后旋值沪变，弃置笼篚中者数月。……中大濮齐材、张至刚、戴志昂诸君，皆身预其役，不辞劳瘁，协力合作。”^⑤文中所说“沪变”当即1932年1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再次表明他带学生考察并测绘智化寺的时间“旧夏”是在1931年。

有照片显示，几乎在同一时期甚至更早，任教东北大学建筑工程系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曾参观或考察了沈阳北陵，但他们并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和图纸记录。所以1931年夏刘敦桢与中国营造学社合作对北平智化寺的测绘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建筑测绘。从《调查记》看，1931年夏刘和学生初探智化寺时只与刘南策和陶洙二人有所合作而尚未接触到梁思成，不过进入营造学社之后，刘应得到了包括梁在内更多学社成员的帮助并得以对调查材料进行补充，所以他在引言的最后说“赖梁思成、刘南策二先生匡助之力居多”，而“协力合作者”除上文已获赞赏的中大年轻教师和学生外，他还提到了自己的新下属“本社邵力工、宋麟征、王先泽、莫宗江”。

或值一提的是，刘敦桢在《调查记》中说到自己在1931年夏到智化寺考察时，其如来殿上层万佛阁著名的斗八藻井“已亡”。而据该年4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2卷第1期《本社纪事》：当时“该寺建筑，虽已残破，而正殿藻井，现存完好，向来外间，未有摄影，本社现已设法照成侧面仰视影片各一纸”^⑥。这说明该藻井是在1931年春摄影之后与刘夏天前去考察之前遭窃盗，最终入藏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刘敦桢与中国营造学社的接触正值该社在办社方式、人员组成，甚至研究方法都在寻求变革之时。

首先是办社方式从私人研究团体向社会性学术团体的转变。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初期的工作偏重于古籍整理和外籍译述，其中包括1927年学社成立之前就已开始的对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整

理，以及对与园沼、《哲匠录》和《营造大事年表》相关资料的搜集。至1929年，朱以研究范围益广，深感个人独立工作之不易，遂商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补助研究费1.5万元，以三年为期，于是“组织营造学社，由私人研究进而成为学术团体”^⑦。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助，同时以出版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方式定期向其提交计划、汇报成果，接受其监督，这一转变在扩大学社经费来源的同时，也使学社的工作得以进一步制度化。

其次是人员组成的变化。《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期出版于1930年7月，即学社“由私人研究进而成为学术团体”之后，其中所列人员组成包括“常务”和“名誉”两部分。

“常务”部分的人选当是创社之初的核心成员，主要由朱启铃和陶湘两家成员和朱的故吏组成，如担任编纂兼日文译述的阚铎（字霍初，1875—1934）为与朱启铃关系密切的北洋政府交通系幕僚^⑧，担任编纂兼英文译述的瞿兑之（名宣颖，1894—1973）是朱启铃的表弟，他祖籍长沙，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母亲傅幼琼（字婉漪，1862—1930）是朱启铃的母亲傅梦琼（字清漪，1844—

1900）之妹，也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隶书刊名的题写者。^⑨担任编纂兼测绘工程司的刘南策（1892—？）为陶湘婿，与陶同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后留日。回国后曾任北平市政府技正，清华大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监工（1929年）。还曾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讲师（1931年）。^⑩除此之外，担任编纂兼庶务的陶洙（1878—1961）字心如，为陶湘弟，也是陶本《营造法式》1925年出版过程中的参校人之一，他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期首页上《宋李明仲先生像》的绘制者，并在1931年春智化寺万佛阁藻井被窃盗之前曾对之摄影记录。^⑪担任学社收掌兼会计的朱湘筠为朱启铃长女。测绘助理员宋麟征曾参与朱启铃主持的北戴河早期建设工程。^⑫由此可见，学社初期的人员组成是以亲属关系或僚属关系为基础。

改组后的学社增加了“名誉”社员部分。如果说“常务”是一个机构的执行部，“名誉”则相当于它的外部支持。学社名誉社员人选包括“评议”“校理”“参校”三类，他们构成了学社核心成员之外的三方面支持。“评议”主要由官员、银行家、社会名流构成，他们充当的应该是董事和赞助人的角色（表1）。

“评议”名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期，1930年7月 表1

姓名	简介
华南圭	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兼职教授、北平铁路大学代理校长
周治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
郭葆昌	陶瓷烧制名家、鉴赏和收藏家，袁世凯总统府庶务司成（总管）
关冕钧	交通银行股东总会候补董事
孟锡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津浦铁路全路总办，北京政府交通部参事，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员，交通银行股东总会候补董事。朱启铃长女湘筠夫孟重远父（？）
徐世章	徐世昌总统堂弟，政治家、收藏家，朱启铃四孙文桀岳父
荣厚	黑龙江省、吉林省财政厅厅长
吴延清	金城银行总处的稽核长，北平金城银行副理
张文孚	中兴煤矿股东，北戴河海滨自治公益会
马世杰	晚清度支部左侍郎、清室退位后溥仪小朝廷内务府大臣绍英之子，精于古瓷器和玉器鉴定
张万禄	青岛市政府秘书处（？）
林行规	1915年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民事司司长，著名律师
温德	Robert Winter，清华大学教授
翟孟生	R. D. Jameson，清华大学教授
李庆芳	袁世凯御用党“公民党”山西同志会首脑，1928年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

注：参见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事略[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129-145.

“校理”一词取自班超《西都赋》“启发篇章，校理秘文”一句，据《汉典》，有校勘整理之意，又为职官名，专掌校勘整理宫廷藏书，唐宋皆有，清代文渊阁亦有此官。学社的“校理”多为著名学者，所以相当于学术委员会委员或资深顾问（表2）。

学社最初的“参校”包括五人：中国年轻学者与建筑师梁思成、林徽音（因）、陈植，以及日本汉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松崎鹤雄（1867—1949）和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献学者桥川时雄（1894—1982）。“参校”并非古代职官之名。据《汉典》，该词义为“参与校订”或“参考其他资料以校勘、订正”。结合几位“参校”学者的专业背景，可以认为他们是学社工作的咨

询专家，也即此时他们尚未参与学社的日常工作（表3）。

依照改组计划，朱启铃在1931年7月将学社分为“文献”和“法式”两组，聘定从1930年7月就已名列学社参校的梁思成为法式主任，9月1日开始工作。^⑦此时梁仍担任东北大学建筑工程系主任，直至翌年6月才离任改赴新职。学社测绘助理除原有的宋麟征之外，又增加了劭力工。^⑧此外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酌量收容了数名东北大学建筑系来平避难学生中成绩较优者，在梁指导下从事辅助绘图工作。^⑨按照该计划，文献主任由阚铎充任，但他在10月辞职，改赴“满洲国”任奉（天）山（海关）铁路局局长。此后，文献主任一职暂由朱启铃兼任。^⑩

“校理”名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期，1930年7月

表2

姓名	简介
陈垣	著名历史学家
袁同礼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叶瀚	晚清维新派人士，教育家，马衡老师
胡玉缙	近现代文学家，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1912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主任、处长
马衡	近代考古学先驱，国立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
任凤苞	银行家、藏书家、交通银行协理、盐业银行董事
叶恭绰	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总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
江绍杰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进士，任安徽芜湖道道尹、安徽安庆道道尹
陶湘	著名藏书家、陶版《营造法式》的出版者
孙壮	前清进士、书法家、收藏家、商务印书馆馆长、河南省博物馆馆长、考古学社社员
卢毅	待查
荒木清三	毕业于日本工手学校，曾赴中国东北地区担任建筑顾问，设计中式建筑。1909—1912年在京师大学堂建筑工程处担任技手，后入营造学社任校理，参加编纂《营造词汇》工作。1932年离社

注：参见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事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129-145。

“参校”名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期，1930年7月

表3

姓名	简介
梁思成	略
林徽音	略
陈植	略
松崎鹤雄	日本汉学家，1920年代—1930年代在大连图书馆任司书，通过各种渠道为日方搜集中国古籍。著有《石经·诸碑——隋唐辽金元碑》《云居寺的石经和房山诸碑》《关帝庙建筑史之研究》等，1934年3月后离社
桥川时雄	日本汉学家，1914年毕业于日本福井师范学校，1918年来华。1923年任《顺天时报》編集局长，1928年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勤务，1933年任该会总务委员。与江瀚、胡玉缙等中国学者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另著有《静嘉堂文库图书分类目录》、《满洲文学兴废考》、《杜甫·诗与生涯》、《民國期の學術界》、《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1940年）等，译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注：参见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事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129-145。

人员组成变化的背后是研究方法的转变。学社创办初期最重要的学术人物是朱启铃、陶湘、瞿兑之和阚铎：朱本人与陶湘等文人合作采用传统方法整理和重刊了《营造法式》；瞿、阚二人都出身于仕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具有出色的传统文献学基础，著述都颇丰。^⑦但总体而言，学社初期有关中国建筑研究的方法基本上仍限于传统的文献整理，这点在1930年学社提交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第一次工作报告中显而易见。报告所列进展事项有：一、改编《营造法式》为读本，二、增补《工部工程做法》图式并编校则例，三、《园冶》之整理，四、编辑辑汇资料，五、编订营造从刊目录，六、采辑营造四千年大事表^⑧，七、《哲匠录》之编辑，八、李明仲之纪念会，九、发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⑨。除八、九两项事务性工作外，其他研究性工作尽管在对象上已经突破传统经史的范围，但所用方法仍以传统的版本校勘学、目录学、名物考释以及类书编纂为主。只有“增补《工部工程做法》图式并编校则例”较有新意。该项工作是梁思成在朱启铃于学社成立之前既已开始的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所做整理^⑩的继续，成果也即他在1932年以现代作图方式整理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该书“首重名词之解释，然后用准确之图，任《做法》《则例》解释之责”^⑪，其方法被他进一步应用于对《营造法式》的注释。

1931年中国营造学社还介入了北平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包括参与《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⑫和维修故宫角楼。但从其总体工作事项可以看出，历代实物调查在此时尚未成为学社工作的内容，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应用更是阙如。1930年6月“日本工学泰斗”伊东忠太曾到社访问朱启铃，并于18日做了题为《支那建筑之研究》的讲演。^⑬他在讲演中说：“在古来尊重文献、精通文献之支那学者诸氏，调查文献绝非难事。对于遗物，如科学的之调查，为之实测制图，作秩序的之整理诸端，日本方面虽亦未为熟练，敢效犬马之

劳也。”^④言外之意，他对学社此时的实物调查能力还有所质疑。事实上朱启铃并未忽视实物调查，他在两年前所写《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曾说：“并应注重实物，凡建筑所用，一椽一椽，乃至冢墓遗文、伽蓝旧迹，经考古家、美术家、收藏家所保存所记录者，尤当征作资料，希其援助。”^⑤不过在当时，因社员知识结构所限，学社在这方面还力有不逮。1931年7月后朱启铃聘梁思成担任法式主任，并增加测绘和制图助手，显然为学社的研究带来了方法上的改变——它有助于强化先前由刘南策和宋麟征负责的实物调查，以弥补伊东所指不足。

刘敦桢的北行考察和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合作测绘也使他得以进入学社的社员群体。1930年12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将他与陈垣和袁同礼等著名学者并列列为“校理”，而此时梁思成、林徽音（因）、陈植等仍为7月出版的《汇刊》第1卷第1期所列的“参校”。这一情况说明他不仅已被学社接纳，而且在文献整理方面被寄予了较之梁、林更高的期待。1932年3月15日朱在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信中首次明确表示出对梁、刘两位年轻学者的高度赞赏和聘用刘的愿望。他说：

“鄙人对本社进行宗旨，于积极方面，固有待时会之来，而物色专攻之人才，以作小规模之试验亦未尝稍懈。曾于本年度改正预算函中奉达贵会，于社内分作两组。法式一部聘定前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梁思成君为主任，文献一部则拟聘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君兼领。梁君到社八月，成绩昭然。所编各书正在印行。刘君亦常通函报告其所得，并撰文刊布。两君皆青年建筑师，历主讲席，嗜古知新，各有根底。就鄙人闻见所及，精心研究中国营造足任吾社衣钵之传者，南北得此二人，此可欣然报告于诸君者也。”^⑥

五、兼职宁苏

然而，刘敦桢此时并未决定离开南方，他或许更希望利用在中央大学工作的身份

在教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之间找到平衡。1929年暑期的北方考察结束之后，他继续在南京和苏州两地兼职。1929年8月1日《苏州明报》报道说：“市工务局工程科长朱士圭，现因受任无锡市政筹备处工程科长，特向柳（士英）局长辞职，柳局长昨已照准，并即委任刘士能代理工程科科长。”^⑦同月7日该报又报道说：“市工务局昨开第三十五次局务会议，出席者柳局长、朱士圭（刘士能代）”^⑧，表明至少在8月，刘同时在苏州市政处兼任代理工程科科长，且于6日前已结束第一次北方考察并到达苏州。同月21日的《苏州明报》还报道说：“市工务局昨开第三十七次局务会议，出席者柳局长、朱士圭【圭】（刘士能代）”^⑨，再次表明刘在学校的暑期之中还在苏州参与市政处的工作。

在刚成为首都不久的南京，刘敦桢也是一位知名的建筑专家。他与同事刘福泰、卢树森（奉璋）合作成立了永宁建筑事务所，并经二人介绍，在1929年2月，也即他入职江苏大学几乎同时，加入了中国建筑师学会。除了担任中央大学大礼堂建筑委员会委员之外^⑩，刘在教学的同时还从事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工作，其中包括在1929年秋季为中央大学设计建筑工字馆^⑪，在1930年与刘、卢二人合作设计苏州市中心改造方案^⑫，同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建筑师，设计该所图书馆。^⑬不仅如此，他在中国古代建筑方面的学识也得到了政府高层的认可。他在1930年9月担任了中山陵纪念塔（未实现）图案评判顾问（图7），1931年1月参与审查中山陵小东山纪念亭^⑭，又在1931年6月被委以中山陵园“光化亭”这一仿古风格建筑的设计。此外，1929年11月他和卢、刘一道还被教育部委以制定南京栖霞寺古迹保护计划之责。《民国日报》对此曾有报道^⑮，表明《年表》所说栖霞山舍利塔维修“创我国以现代科学方法修葺古建筑之首例”诚非虚言（图8）。这些工作无疑丰富了刘敦桢对建筑设计、建造和城市规划及市政管理的认识，更重要的

是还有助于他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建筑和城市的历史面貌，并引发他对建筑学范畴与建筑历史研究对象的思考。而对于他的建筑史研究而言，栖霞寺舍利塔还成为他1931年和1933年所写两篇文章引用的证据。^⑯

尽管尚未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但身在南京的刘敦桢与学社依然保持联系。1930年12月《汇刊》第1卷第2册发表了阚铎根据朱启铃搜集的资料所写的《元大都宫苑图考》，其中涉及角楼建筑。^⑰此时学社也正参与紫禁城南面东西两角楼的修理工程。^⑱了解到这些工作之后，刘在1931年12月16日撰写了一篇短文，对角楼作为一种城墙和宫墙建筑形制的历史进行了追溯，作为“社员通讯”在1932年3月出版的《汇刊》第3卷第1期发表。他在文章的开篇说：“前在北平，见南策兄所绘皇城角楼各图，及阅社刊《元大都宫苑图考》内角楼诸条，极感兴趣。”^⑲

朱启铃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曾说：“古人宫室制度之见于经史百家者，皆宜取证。”^⑳《元大都宫苑图考》或许就是他这一想法的实践。该文全文共分十节，分别为“绪论”“宫阙制度”“诸作及铺设”“太庙及社稷坛（郊坛先农坛附）”“工料之特色（……丙角楼）”“经始设计之工师名匠及工官”“河流”“宫殿轶名”“与辽金制度之比较”，以及“余录”。在体例上，这篇长文与清中叶由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等人编纂的《日下旧闻考》一书中的《国朝宫室》《皇城》《国朝园囿》等卷相仿。其增加有关建筑布局图示的做法也有宋代学者晁公遡所著《三礼图》，清代学者焦循所著《群经宫室图》，以及近代学者王国维所著《明堂庙寝通考》等先例。但《元大都宫苑图考》更偏重建筑营造，反映了中国营造学社关注的议题。其中有关也黑迭儿、张柔和段天佑等设计之工师名匠的介绍得益于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的考证。尽管阚铎有意将大都与辽金的“宫室制度”相比较，但限于史料，该节极为简略，仅涉及“大内方向”“宫城角楼”“帝后各有正位”这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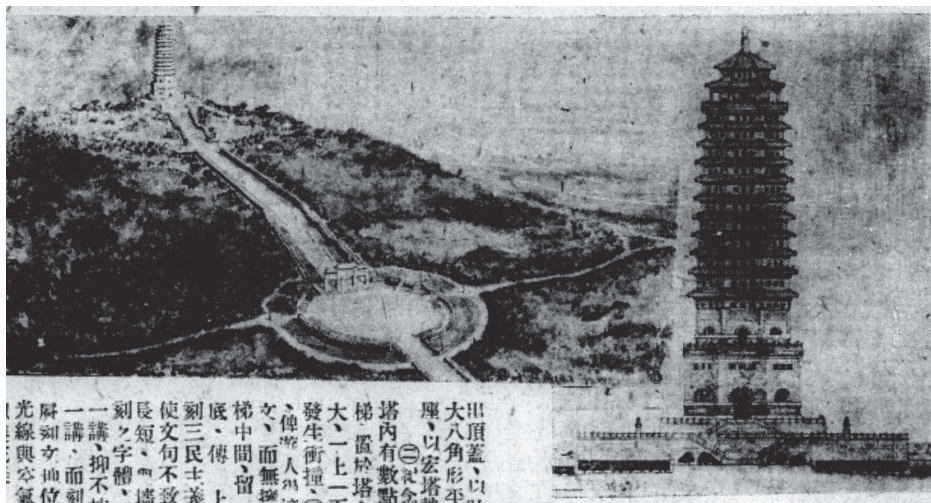


图7: 总理纪念塔设计竞赛范文照、赵深方案, 刘敦桢等为纪念塔图案评判顾问, 1930年



图8: 栖霞寺舍利塔(修葺), 南京, 1931年

点与辽金制度的一致性。

刘敦桢对角楼作为城墙和宫墙形制之一部分所做的溯源连带标点不过 1200 余字, 但足以显示他不凡的文献功力。文章引用了石鼓文、齐公豆、《殷墟书契》《考工记》《前汉书》《三国志》《邺中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隋史》《宋史》《辽史》《北盟会编》《辍耕录》《故宫遗录》《明史》和唐代诗人元稹的诗等近 20 种文献以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 所编《敦煌图录》中的图像资料。他证明: “角楼肇源三代, 殆非诬妄。……元大都之角楼, 沿袭我国旧制, 毫无疑问”。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曾提出蒙元仿效汉法建造宫阙的观点。刘文的结论无疑可作为陈垣的补充证据。乾嘉时期的著名经学家焦循在其著作《群经宫室图》中曾否定唐代学者贾公彦认为《前汉书》中“累恩/浮思”即小楼这一观点。刘对焦直言批评, 说他“割经取义, 非公允之论也”^⑩。刘较时任学社文献主任的阚铎年轻 23 岁, 但他这篇短文表现出的文献功力已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猜想必能给朱启铃和其他学社同仁留下深刻印象。3 个月后出版的第 3 卷第 2 期《汇刊》中他的名字就作为“文献主任”正式出现在“本社职员”名单之中。

(未完待续)

注释

- ① 林洙. 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5: 122.
- ② 同上: 121. 按: 朱鸣泉, 1928 年生, 浙江鄞县人, 毕业于弘毅中学。曾任吴一清等主持的 (上海) 华基建筑师事务所从业人员, 1953—1964 年任职于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与南京工学院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室, 为刘敦桢著《苏州古典园林》研究、测绘、制图、摄影主要成员之一。
- ③ 赖德霖. 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 ④ 刘敦桢先生生平纪事年表 (1897—1968) [M]// 刘敦桢全集 (十).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221-215.
- ⑤ 刘叙杰. 创业者的脚印——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 [M]// 杨永生, 明连生编. 建筑四杰: 刘敦桢、童雋、梁思成、杨廷宝.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7-21.
- ⑥ 苏州工专教职员之呼吁 [N]. 时事新报, 1925-2-16 (11).
- ⑦ 据柳士英曾孙陈平先生惠示的《苏州工专复校纪念册》(“复校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辑, 上海: 苏州工专上海同学会出版, 1947 年), 柳士英担任建筑科主任时间是 1923 年 9 月至 1927 年。
- ⑧ 据 1928 年担任长沙市政筹备处处长的鲁岱 (字了翁) 回忆: “天心阁, 位于长沙东南角城垣上, 是一风景区, ……历为市民游憩之地。唐生智主湘政时期, 把它拆毁, 另在原址建三个阁。工未完, 省政府连番改组, 就无暇及此而停了摆。我在接任之时, 三阁只有阁墩, 而无阁楼, 远望之如土堆, 近观之为废墟。……我命第二科造一完成三阁的预算, 呈请省府拨款, 以便施工。……后来招标结果, 由长沙一家建筑商得标。经之营之, 不日成之, 三阁鼎峙, 矗立天空, 画栋飞云, 珠帘卷雨, 别有一番新气象。”见: 鲁了翁. 长沙辟市琐忆 [J]. 湖南文献, 1975, 3 (4): 28-32. 查唐生智主湘政时期为 1927 年 7 月至当年 11 月。如此, 则目前较为世人所知的天心阁三阁方案当非刘敦桢所设计。
- ⑨ 刘敦桢. 《营造法原》跋 (1943 年 7 月) [M]// 刘敦桢

- 全集 (四).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68. 按: 疑《全集》版该文“1926 年秋”在原刊稿中当为“民国丙寅秋”。
- ⑩ 陈从周. 姚承祖与《营造法原》(1), 姚承祖与《营造法原》(2) [M]// 陈从周全集 (12): 梓室余墨.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81, 160.
- ⑪ 吴县营造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并敬谢来宾启示 [N]. 苏州明报, 1931-7-10 (1).
- ⑫ 刘敦桢. 《营造法原》跋 (1943 年 7 月) [M]// 刘敦桢全集 (四).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68. 张至刚. 自序 (1956 年) [M]// 姚承祖原著, 张至刚 (编) 增编: 刘敦桢校阅. 营造法原. 2 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3-5.
- ⑬ 徐苏斌. 近代中国建筑学的诞生 [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0: 124. 除伊东和关野外, 曾师从木子清敬的日本第一代现代建筑家还包括大江新太郎 (1879—1935) 和武田五一 (1872—1938), 见: Cherie Wendelken. The Tectonics of Japanese Style: Architect and Carpenter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J]. Art Journal, 1996, 55 (3): 28-37.
- ⑭ 邹恩润, 徐亮. 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投考须知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4.
- ⑮ 施用. 我国高等建筑教育的发源地——苏工创办建筑科史料补遗 [J]. 南方建筑, 2000 (1): 63-66.
- ⑯ 刘敦桢. 大壮室笔记 [J].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2, 3 (3): 170. 按: 原文“滨”当为“浜”。
- ⑰ 委任令: 兹委任刘敦桢为技师兼建设股主任 [M]// 苏州市政筹备处编. 苏州市政筹备处半年汇刊 (1927 年 7 月—12 月). 关于苏州市政筹备处, 见: 吴县县长已委定 [N]. 苏州明报, 1927-6-11 (2).
- ⑱ 市政处技正另有高就 [N]. 苏州明报, 1928-2-24 (2).
- ⑲ 市政处公饬刘技正 [N]. 苏州明报, 1928-2-25 (3).
- ⑳ 刘叙杰. 创业者的脚印——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 [M]// 杨永生, 明连生. 建筑四杰: 刘敦桢、童雋、梁思成、杨廷宝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7-21.
- ㉑ 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小史 [J]. 中国建筑, 1933, 1 (2): 34.

②② 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开常会记[N].申报,1928-4-21(11).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民国日报,1928-4-21(4).

②③ 科学社社友明日开大会[N].民国日报,1928-2-3(4).

②④ 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开常会记[N].申报,1928-4-21(11);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N].民国日报,1928-4-21(4).

②⑤ 刘敦桢.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J].科学,1928,13(4):506-513.按:本文收入《刘敦桢全集(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1-3页),但部分段落或字句已经补充或改写.本文引文皆据刘初刊稿.

②⑥ 刘敦桢.田径、游泳竞技运动法[J].教育杂志,1922,14(5):1-26.按:本文不见于《刘敦桢全集》,故是刘的一篇佚文.

②⑦ 沪华海公司工程师宴客并论建筑[N].申报,1924-2-17,本埠增刊(1).

②⑧ 董增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4-19.

②⑨ 伦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东方杂志,1916,13(10):1-8.

③⑩ 章行严(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J].东方杂志,1919,16(11).被收入:王均熙.章士钊全集(四)[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109-117.

③⑪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1920.

③⑫ 陈垣致欧阳祖经信,1964年2月4日.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18.

③⑬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1.

③⑭ 冯天瑜,杨华.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绪论》[M]//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9-31.

③⑮ 刘敦桢.中国之塔[M]//内政部编印.公共工程专刊(第一集).1945:57-60.

③⑯ 伊东原文是:“自然物中,日、月、星、云、水、冰、山、岩石等种类,虽属不少,然常用者为云与水,……几何纹之种类甚多,……古铜器中所见者,有雷文、云文、粟文、弦纹、蟬文(蟬虽动物而已几何化矣)等”.此处中译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陈清泉译补.上海:上海书店,1937:60.刘敦桢所读当为伊东在1925年8月至1926年7月在《东洋史讲座》发表的《支那建筑史》.徐苏斌教授曾比较过《支那建筑史》的不同版本.据她2022年6月3日告知,1926年和1940年版的前半部分完全一样,后半部分加了六朝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在1931年版中已写.而根据译者识语(261页)可知,其所补内容为书中的“附录:《营造法式》摘录”.

③⑰ 关野贞.天龙山石窟[J].国华,1921(375).参见: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57-68.“第六十图:第十六第十七窟外观”,“第六十一图:第十六窟入口金刚力士”,参见: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M].金尾文渊堂,1922.

③⑱ 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M].东京:金尾文渊堂,1922.

③⑲ 参见: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31-38;葛兆光.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J].世界历史评论,2021(6):3-68,200;陈慈玉.案牒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面向

[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42):1-45.

④⑩ 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中文翻译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陈清泉译补.上海:上海书店,1937:13-14.

④⑪ 同上:12.

④⑫ 刘敦桢.琉璃窑铁闻[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173-177.

④⑬ 中大建筑科学生组织参观团,参观古今建筑[J].民国日报,1929-6-27(4).

④⑭ 刘敦桢.北平清官三殿参观记[J].工学,1930(创刊号):77-86.按:本文不见于《刘敦桢全集》,故是刘的一篇佚文.感谢徐苏斌教授告知并惠赠这篇重要史料.

④⑮ 徐苏斌.刘敦桢先生早期建筑思想研究——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建筑观[M]//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61-65.

④⑯ 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M].1925:80.

④⑰ 伊东说:“清承明之文化,仍急向低落而行.康熙、乾隆时代,虽放一道之光明,未几又急转直下,学问艺术皆无生气,徒祖述古人之皮相而已.清初虽有《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佩文韵府》《西清古鉴》诸大作,但只可谓为整理编纂古人之著作,不得谓为独创之新著.艺术亦然:许多大建筑,皆蹈袭前代之式样而不能及之.”见《支那建筑史》,32-33页.

④⑱ 刘敦桢.明长陵[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2):42-59.

④⑲ 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1-69.

④⑳ 刘既漂.中国美术建筑之过去及其未来[J].东方杂志,1930,27(2):133-139.

⑤① 见:刘既漂.“中央党部正面图”“国家图书馆”[J].贡献(刘既漂建筑专号),1928,3(6);“中央党部回廊图”“国民政府署西立面图”“国民政府总署进口透视图”“国民革命军纪念馆”[J].旅行杂志,1929,3(4);“国民政府署俯视图”“国民政府署南面透视图”,见:建筑师刘既漂及其作品[J].良友,1929(35):37.关于刘既漂,另请参见:郑红彬.调和中西以创中国新建筑之风——刘既漂的“美术建筑”之路及其解读[J].南方建筑,201(6):77-85.

⑤② 赖德霖.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现代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J].艺术史研究,2003(5):471-503.

⑤③ Joseph Edkins. Chinese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亚东学会华北支会月报),XXIV,1889-90:253-288;瞿祖豫译.英人爱迪京中国建筑[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2):1-28.

⑤④ 刘敦桢.明长陵[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2):42-59.

⑤⑤ 同上.

⑤⑥ 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1-69.

⑤⑦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28、32次会议记录(1931年1月26日,6月26日)[M]//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571,580.

⑤⑧ 朱启钤自撰年谱[M]//朱启钤.营造录——暨朱启钤纪念文集.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140.

⑤⑨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1930年2月16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1-10.

⑥⑩ 本社纪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87.《汇刊》第5卷第2期(1934年12月)《本社纪事》中就“供给国内外学术团体及私人参考材料”做出统计,其中包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用中国建筑模型及彩画标本”,当系1929年夏刘敦桢所订制.

⑥⑪ 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111.按:书中111页第14行“1936年”当为“1931年”之误.

⑥⑫ 本社纪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87.

⑥⑬ 滨田耕作著;刘敦桢译注.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60(补注11.滨田原作1926年5月发表于《内藤博士還歴記念支那學論叢》).感谢刘涤宇博士告知这条史料.

⑥⑭ 本社纪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85.

⑥⑮ 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2.粗体中文字为《刘敦桢文集》(1982年)和《刘敦桢全集》(2007年)所无.

⑥⑯ 本社纪事:智化寺藻井照片二纸[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1):14.

⑥⑰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缘起(1929年3月24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1-6;国内唯一学术团体,营造学社之概况[N].华北日报,1936-11-15(6).按:中国营造学社获得中基会赞助时间是1929年6月底.见:教育文化基金会重要议决案[N].华北日报,1929-7-2(5).

⑥⑱ 闾铎(1874—1934),字霍初,号无冰,安徽合肥人.1902年赴日留学,日本铁道学校本科毕业,后入日本高等警察学校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湖广总督文案、湖北布政使司秘书、江苏提法司科长.民国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秘书、交通部金事、路政司科长,1916年外放为京绥铁路管理局副局长,1917—1925年先后任吉长铁路、齐齐哈尔铁路、四洮铁路和济济铁路管理局局长、汉粤川铁路参赞,1926年任汉粤川铁路督办,1927年任内务部参事、司法部秘书、司法部总务厅长.在司法部总务厅长任内,辅助交通系领袖之一的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为学社最早的全职职员之一,任编纂和文献部主任.他和日本籍社员松崎鹤雄、桥川时雄等交往密切.“九·一八事变”后,闾离开学社,赴满洲国担任奉天铁路局局长,兼四洮铁路管理局局长.参见:傅凡.闾铎传统建筑与园林研究探析[J].中国园林,2016(1):65-67.

⑥⑲ 侯磊.瞿宣颖与北京:一位民国“史官”的居日常[M]//瞿宣颖主编;侯磊整理.北京味儿.北京:北京出版社,2022;俞汝捷.花朝长忆颉颃师[EB/OL].新语丝,2004-1-26,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qutuiyuan.txt.

⑦⑩ 参见: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30.

⑦⑪ 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32.

⑦⑫ 宋麟征(1901—?)早年在青岛德国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并习建筑.后随朱启钤从事工程方面工作,参与北戴河早期建设工程.在营造学社创社初期协助闾铎研究元大都宫苑并绘制图纸.1932年6月前离社后先后任职北平故宫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印刷所、故宫工程小组(修建处前身)和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参见：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34.

③本社纪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83.

④邵力工（1904—1991），籍贯北京。1921年北京工业专门学校辍学，1927年入（美）万国函授学堂（I.C.S. Scranton, PA.）土木科肄业四年。1921—1930年曾在（北京）（美商）Jellver Architect 事务所实习建筑工务，任（北京）美以美会建筑部测绘员，美国工程师 Van Camp 助理，（奉天）（丹商）华久公司设计监工，（北平）公和祥营造厂建筑营造师，（天津）（法商）永和营造管理公司设计绘图，（北平）海淀燕京大学工程处设计绘图，（天津）华中公司工程设计绘图，（上海）扬子建筑公司打样兼设计部设计绘图。1931年1月申请实业部技师登记。1932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助理；1933年9月随刘敦桢查勘北平市工务局正在修理的鼓楼平座及上层西南隅角梁，并绘简图附加说明送该局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合刊，1934年6月，342页）；1935年成为正式会员。曾在梁思成指导下绘制清工部工程做法补图、测绘故宫中路建筑，因“七·七事变”未完成。1937—1949年任（北平）力工建筑补习学校校长兼教员。1949年后先后任中国建筑企业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部部长、主任工程师，1958—1962年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历史室工程师，1962—1964年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1964—1966年任大庆油田指挥部总工程师，1966年退休。参见：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34.

⑤本社纪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83.按：被营造学社接收的东北大学学生中当有王先泽（字孝鼎，1908—？），陕西西安人，193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建筑工程系。1932年4月随梁思成调查宝坻广济寺三大寺殿，同年秋协助刘敦桢补测北平智化寺，1934年还与流亡校友刘致平、丁凤翎、白凤仪等协助梁思成测绘杭州六和塔。事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相关调查报告。

⑥本社纪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83.

⑦瞿兑之曾出版《方志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2期，1930年12月，广告）、《旧京发现岐阳王世家文物纪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1932年3月，115-122页），以及《汪辉祖传述》《中国骈文概论》《北平史表长编》《中国历代社会史料丛抄》等。他还曾与艾克（Gustav Ecke）和叶公超节译了德国建筑家鲍希曼所著《中国宝塔》（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186页）。参见：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33. 阙铎在任职中国营造学社期间曾参与校勘《营造法式》，还曾校勘计成《园冶》、李斗《扬州画舫录·工段营造录》、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任启运《宫室考》等，并为编纂《营造辞汇》而赴日，著有《李明仲先生补传》、《仿宋重刊〈营造法式〉校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1期，4-6，1-28页）、《营造词汇纂辑方式之先例》、《参观日本建筑术语词典编纂委员会记事》。参见：傅凡.阙铎传统建筑与园林研究探析[J].中国园林，2016（1）：65-67.

⑧这方面工作以单士元编纂的《明代营造史料》（《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2期，1933年9月，

88-99页），以及与王壁文合编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为代表。

⑨社事纪要[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2）：1-5.

⑩朱启铃.营造算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1-3）.按：原刊无作者名，现据梁思成著《营造算例》初版序（1932年2月）“近年朱先生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对于这种手抄本，尽力搜求。……为求早早供之学者，已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二卷一期起分三次付印”之句，确定为朱启铃。

⑪1932年3月出版的第3卷第1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本社纪事》中介绍《清式营造则例》说：“原《工程做法则例》及《营造算例》二书，前者既非做法，又非则例，严格命名，只能称为‘木料尺寸书’，后者则为算例，对于做法，仍多不详。而二书对于建筑专门名词之定义，尤无一字之解释，使读者只见满纸怪名词而无从下手。《营造则例》一书，首重名词之解释，然后用准确之图，任《做法》《则例》解释之责。……于研究清式建筑初辟途径，想当为建筑界所乐睹也。”（184页）文中“既非做法，又非则例”和“只见满纸怪名词而无从下手”之句在梁思成著《营造算例》初版序（1932年2月）中亦有相同或极相近的表达，相信这篇介绍也为他所写。

⑫宋永林.1931年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影响探析[J].北京档案，2021（5）：58-60.

⑬社事纪要：伊东忠太博士讲演支那之建筑[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2）：1-11.

⑭日本伊东忠太博士讲演[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2）：1-11.

⑮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缘起（1929年3月24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1-6.

⑯朱启铃.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继续补助本社经费函[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2）：161-163.

⑰工务局工程科长易人[N].苏州明报，1929-8-1（3）.

⑱苏锡将通行轮船，市工务局昨开局务会议[N].苏州明报，1929-8-7（3）.

⑲市工务局会议记，取缔上海式的住宅[N].苏州明报，1929-8-21（3）.

⑳中央大学大礼堂的建筑[N].申报，1930-5-8，本埠增刊（7）.

㉑中大筹备建筑工学馆，经费预算需款二十四万[N].民国日报，1929-10-14（4）.

㉒改造新苏州之市中心设计图说——苏人不可不读：一篇极有价值之作品[N].苏州明报，1931-1-1（3）.

㉓中国营造学社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呈请登记建筑科工业技师案（1934年12月—1936年5月）[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四二二（3），1406.（感谢汪晓茜教授代为核对）

㉔《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22、28次委员会会议记录》（1930年9月12日、1931年1月26日），见：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559，571.

㉕教部派员视察栖霞古塔，积极保全栖霞古迹[N].民国日报，1929-11-30（1）教部派员计划保护栖霞古迹[N].民国日报，1929-12-10（4）.

㉖刘敦桢.《“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并补注（1931年12月）[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61-74；复艾克教授论六朝之塔（1933年3月6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1）：138-147.

㉗朱启铃辑考推定，阙铎整理，宋麟征制图.元大都宫

苑图考[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2）：1-118.

⑳本社纪事：（五）勘验报告紫禁城南面角楼城台修理工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1）：15-16.

㉑社员通讯：刘士能论城墙角楼书（1931年12月16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79-180.

㉒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缘起（1929年3月24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1-6.

㉓社员通讯：刘士能论城墙角楼书（1931年12月16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79-180.按：原文排版有大段错行，第179页最后一行“循”以下至180页倒2行“元”共14行字应接于179页倒6行“焦”字之后。参见《刘敦桢全集（一）》中的新排版。另，刘敦桢对古人的批评还见于《大壮室笔记》中“辨《辍耕录》‘记南宋宫殿’之误”一条”。见：大壮室笔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170-171.

参考文献

- [1] 陈慈玉.案牍研究与田野调查：日本东洋史学之一面向[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42：1-45.
- [2] 陈从周.梓室余墨[M]//陈从周全集（12）.南京：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 [3] 陈薇.阅读两部中国建筑通史 体味一个世纪史学命脉[J].建筑师，2008（4）：85-90.
- [4] 陈垣.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5] 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6] 董增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4-19.
- [7] Joseph Edkins. Chinese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亚东学会华北支会月报），1889-90（XXIV）：253-288.
- [8] 冯棣.黄沁雅.黄福丹.半部中国建筑史的佐证研究——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西南的学术史贡献[J].建筑学报，2021（9）：70-77.
- [9] 冯天瑜.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 [10] “复校纪念刊编辑委员会”编辑.苏州工专复校纪念册[Z].上海：苏州工专上海同学会，1947.
- [11] 傅凡.阙铎传统建筑与园林研究探析[J].中国园林，2016（1）：65-67.
- [12] 葛兆光.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J].世界历史评论，2021（6）：3-68，200.
- [13] 赖德霖.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 [14]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1920.
- [15] 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 [16]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17] 刘敦桢.田径、游泳竞技运动法[J].教育杂志，1922，14（5）：1-26.

- [18] 刘敦桢.北平清宫三殿参观记[J].工学, 1930 (创刊号): 77-86.
- [19] 刘叙杰.创业者的脚印——记建筑学家刘敦桢的一生[M]//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刘敦桢、童雋、梁思成、杨廷宝.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7-21.
- [20] 鲁了翁.长沙辟市琐忆[J].湖南文献, 1975, 3 (4): 28-32.
- [21] 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 [2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七)[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 [23] 瞿宣颖主编,侯磊整理.北京味儿[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22.
- [24] 单士元,王璧文编.明代建筑大事年表[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9.
- [25] 邵磊.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兴废史事钩沉[J].南京学研究, 2021 (3): 45-61.
- [26] 施用.我国高等建筑教育的发源地——苏工创办建筑科史料补遗[J].南方建筑, 2000 (1): 63-66.
- [27] 宋永林.1931年圆明园遗物文献展览会影响探析[J].北京档案, 2021 (5): 58-60.
- [28] 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M].金尾文渊堂, 1922.
- [29] Cherie Wendelken. The Tectonics of Japanese Style: Architect and Carpenter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J]. Art Journal, 1996, 55 (3): 28-37.
- [30] 徐苏斌.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9.
- [31] 徐苏斌.刘敦桢先生早期建筑思想研究——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建筑观[M]//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编著.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 61-65.
- [32] 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刘敦桢、童雋、梁思成、杨廷宝[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 [33] 姚承祖原著,张至刚(鏞森)增编.刘敦桢校阅.营造法原[M].2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 [34] 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M].(中文翻译见: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M].陈清泉译补.上海:上海书店, 1937.)
- [35] 俞汝捷.花朝长忆蛻园师[EB/OL].新语丝, 2004-1-26,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qutuuiyuan.txt>.
- [36] 中国营造学社文献组主任刘敦桢呈请登记建筑科工业技师案(1934年12月—1936年5月)[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四二二(3), 1406.
- [37]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经典范式《易县清西陵》[J].建筑师, 2021 (6): 31-39.
- [38] 邹恩润,徐亮编.江苏中等以上学校投考须知[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
- [39] 朱启铃.营造录——暨朱启铃纪念文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9.
- 尚有其他参考文献来自《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苏州明报》《苏州市政筹备处半年汇刊》《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

图片来源

- 图1: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2, 3 (3): 170.
- 图2: [N].苏州明报, 1928-2-24 (2).
- 图3: 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M].东京:金尾文渊堂, 1922: 第六十一图。(按: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图版19“齐隋建筑遗例”中的“山西太原天龙山北齐石窟”图也描绘自外村太治郎这张照片。)
- 图4: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十)[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244.
- 图5: 刘敦桢.明长陵[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3, 4 (2). [按:原图当采自(日)山本赞七郎《北京名胜》, 1906年]
- 图6a: 南京城建档案馆授权发表
- 图6b: 费文明先生摄赠, 2022年
- 图7: 总理纪念塔计划之一斑[N].时事新报, 1930-12-5 (4).
- 图8: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0: 137.